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郑振铎自述

郑振铎 著 / 文明国 编

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重要倡导者

著名作家、学者、评论家、文学史家、

艺术史家、翻译家、收藏大家

郑振铎先生自述生平、创作、学术、思想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郑振铎自述

郑振铎 著 / 文明国 编

ZHENG ZHENDUO ZISHU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振铎自述 / 郑振铎著 ; 文明国编 . - 合肥 :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1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ISBN 978-7-5396-4257-4

I . ①郑… II . ①郑… ②文… III . ①郑振铎 (1898 ~ 1958)
传记 IV .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0757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刘珊珊

特约编辑：韩美玲

封面设计：汪要军 闻 艺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0316) 6658662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4.5 字数：430千字

版次：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2次印刷

定价：5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编 自述与回忆

最后一次讲话·····	3
访笺杂记·····	12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	22
我译民俗学·····	24
我译高加索民间故事·····	26
我为什么写中国文学史·····	28
我论中国文学·····	34
《欧行日记》自记·····	37
我的几篇演讲与论文·····	39
关于版画·····	41
我为什么编《晚清文选》·····	54
我的藏书生涯·····	57

再说我的藏书生涯·····	61
蛰居时期的一段记录·····	66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68
求书记·····	71
我看中国早期木版画·····	90
我为什么纂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93
再说我为什么纂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96

第二编 序与跋

《诗歌》短序·····	107
《战号》献词·····	109
《取火者的逮捕》新序·····	111
《西行书简》题记·····	113
《西行书简》跋·····	115
《蛰居散记》自序·····	124
《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原序·····	126
《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再版序·····	128
《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叙言·····	130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引言·····	133
关于译著《灰色马》·····	135
《沙宁》译后记·····	136
《泰戈尔诗选·新月集》译者自序·····	138
研究民歌的两条大路·····	141

第三编 师友忆往

丰子恺和他的漫画·····	147
程及和他的水彩画·····	150
记吴瞿安先生·····	152
忆愈之·····	158
一位最好的先驱·····	162
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	169
一 胡也频先生·····	170
二 洛生先生·····	175
三 徐志摩先生·····	177
记黄小泉先生·····	183
永在的温情·····	187
鲁迅先生并不偏狭·····	194
忆冲锋的老战士鲁迅先生·····	197
悼夏丐尊先生·····	199
悼许地山先生·····	205
耿济之先生传·····	211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	215
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	221
忆六逸先生·····	227
哭佩弦·····	232
忆贤江·····	237
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240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245
悼王统照先生·····	253
林琴南先生·····	259
梁任公先生·····	276

第四编 学术主张

何谓“俗文学”·····	317
《文学大纲》叙言·····	332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336
世界文库发刊缘起·····	364
文学的定义·····	371
文学的使命·····	377
整理古书的建议·····	381

郑振铎

自
述



第一编

自述与回忆

最后一次讲话^①

今天是个难得和大家思想见面的好机会。在这里的王伯祥、俞平伯、潘家洵都是我四十年的老朋友。这次整风，有机会检查自己的缺点，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好处。参加土改、“三反”、“五反”几次大的运动都和我们关系不大。这次检查比以前泛泛而谈好些。很多人觉得压力很大，这是有人类以来的最大的改变，在这基础上了解自己的过去比较清楚一些。

学术文化有时走在时代前面。中国新文化运动从“五四”开始就走在前面。左翼文化运动也如此。现在还应如此。学术研究应该接受大的时代潮流的影响，走在时代的前面。我自己思想感情就应该是共产主义的。我的立场基本上改变是不会成问题的。

今天主要谈过去的著作。我不能解释为那是二三十年前写

^① 此稿是作者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次“学术批判会”上发言的摘录。标题是《郑振铎全集》之编者所加，因为这是郑振铎一生中，最后一次在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的东西来原谅自己。过去总觉得自己很进步，这种包袱反而阻碍自己不断进步。

我是生长在浙江温州的福建人。祖父在那里做小官吏。家庭中没有固定的房地财产。有钱时很阔气，没钱时靠借钱度日。祖父死后家庭生活很困苦。叔叔在外交部做个小军官，全家靠他寄钱回家维持生活。母亲在端午节时还做些玩具出卖。我在北京念书时，住在叔叔家很清苦，每天中午饭不过吃十分钱。当时上的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培养成为全能的铁路工人；曾做过一个时期的练习生，因电报打不好就不做了。一九一九年时我兴趣是多方面的，就和瞿秋白、耿济之等在一起，想出版一个青年读物《新社会》，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当时根本没想到什么稿费的问题。经费是靠一个美国的广告。“五四”时期出版的很多刊物都是如此。利是不考虑的，也无名可言，是用的笔名，当时风气很好。我负责《新社会》的校对。这个刊物巴金家还存有一份。那时张作霖在北京，他的门口架着机关枪，走过门口阴森森的挺可怕。后来因刊名叫“社会”，又加个“新”字，有社会主义倾向，就被封了。经理被捕，放出来后还出了一期《人道》（月刊）。上面登过《国际歌》，瞿秋白译意我写歌词。

“五四”运动前一天，五月三日开会；我们因是在小学校，没能参加。我家住在赵家楼附近，火烧赵家楼时我去看了，抓去很多学生。第二天开学生联席会，我也参加了。几千个学生被关在天安门中的两个门洞之间。我们就打算送吃的、送铺盖去。学校提前放暑假，免票送学生回家。而放假后全国的学校都动起来了。当时学生开会多在汇文中学。参加李大钊同志领

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开会前，李大钊同志总在周围走一圈，参加的人各种派别的都有。那时北京学生很大部分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崇拜“三不主义”（不做官、不坐车、不娶妾），对军阀十分痛恨。这种观点的人现在还有不少，施复亮当时也是如此。因我没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思想上仅有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

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南站做铁路上的练习生，住在一个花园里，叫我挂钩。不想干。正好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做《小说月报》的编辑。因我爱好文学，他约我编小学教科书，把文言改为白话。我没答应，就编儿童读物《儿童世界》（周刊）。稿子几乎是我一个人写的，画配得很好，是许敦谷画的。

我们对《礼拜六》骂得很凶，他们也骂茅盾“老板”。一九二三年就把我调去主编《小说月报》。这时正是大革命到来的前夕。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我没去，晚上去街上看，地上都是血，墙上的枪洞还是热的。对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第二天所有上海报纸只有一条小消息。于是“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决定主办《公理日报》，报头字是叶圣陶写的，标题是我写的，钱是捐来的。《公理日报》于六月三日出版，出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反动当局无理查禁了。王伯祥那时都去送报，影响很大。我们把稿子放在洋车的垫子下，有的军队来了很客气，问我们要不要帮助？要多少钱？我们不要他们帮助。《公理日报》的停刊宣言是我写的，非常愤慨，后来把激烈的字都删掉了。

北伐时，工人运动十分激烈，由邮政局、商务、电力公司

三个工会带头组织起来。商务印书馆三个工会；我参加编辑所工会。北伐军快到上海时，我们就把鞭炮放在洋油筒中放，用槌子打铁当炮响。北伐军来时我们兴奋得不得了，去慰问时就像一家人一样。去过几次。后来白崇禧的部队也来了，开始清党。我是闸北工会代表。我接到通知很多人被杀。我拿到一点版税作路费，一九二七年五月到欧洲去了。在法国巴黎住了半年，英国住了一年。在法国图书馆看中国书，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看变文。这期间受了很多气；没有受外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写了很多游记，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我没有考博士的思想。当时平伯也在那儿。后来又意大利去了一下，回法国后归国。再编《小说月报》时王云五订了很多规章。工会提出打倒王云五，没打倒他。他不走，我们就走！圣陶走了，我也离开了。我们对资本家是非常痛恨的，这是有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缘故。

北京的中学那时都是老夫子教的，很少人教新文学。到处叫我去讲新文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找我教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当时新月派有个组织，胡适、徐志摩都在里面。他们每天闲谈。我们就反对他们。创办《文学季刊》和“左联”有些联系。当时和姚蓬子联系，发现他是个大坏蛋。

我在燕京大学代表进步的一派。校领导就很恨我。司徒雷登是个老狐狸。他唆使一批教员和学生一齐排挤我。我提出辞职，有些学生很同情我。我离开燕京后，吴晓铃也走了。思想上这时也起了一些变动，想应该走另一条路。我对国民党那种残酷镇压很痛恨，后来从北京又到上海。

最可怕的是在暨南大学教书，当时该校 CC 派和军统斗争很尖锐。呆了好几年。这几年凡是有标语出来，都说是我贴的。

每次纪念周，想不参加都不行。说到蒋介石，大家都得站起来，我却一个人坐在那里。学生都拿手枪，被开除的很多。党的工作做得很好。太平洋事件日本兵进上海，我还在给学生上课。后来全校决定停课。

抗战期间，生活很艰苦。生活来源没有了。当时在上海的人很多，圣陶到四川去了，日本人来的第二天许广平就被捕了。她上、中、下三层都有联系。放出来时，她头发全白了，路也走不动了。日本人对她用了很多次电刑，她一句话也没说出，保存了很多同志，柯灵被打得一塌糊涂，陆蠡被抓后不见了。那时王伯祥生活比较正常，但我们对他有意见。那时我假装成文具商人。因上海有被轰炸的可能，党派人来找我。上海有社会科学讲习所，我在那里教过书。开明书店也关了，我没地方去，就到旧书铺去看书。日本人在旧书铺找我时，却没找到。日本人问起我时，他们说我已好久没去看书了。其实当时我正在那看书。

日本投降后，控制得更严了。我在南京中央图书馆作编辑，在上海拿钱，就靠出书维持生活，印珂罗版的书，和李健吾一起编《文艺复兴》。到一九四九年时，形势已经很紧迫，预感到非逃不可了，才逃到香港。本来和曹禺一块走，后来陈白尘帮助我到香港；又由烟台到北京。

我的生活很简单，由编辑到教书；偶尔参加一些运动，也不深入。我和党有联系，党处处照顾我。离开上海时，党还问我要不要钱。我思想上应该很进步，但从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自己还背着一个进步的包袱，其实和出生入死的同志们是不能比的。不应该有这个进步的包袱。《中国俗

文学史》还自认为是有些进步思想的；但著作中从头到尾看不出有马列主义的影响。

我研究文学是半路出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去还有一个时期写的多是为了生活，有时一天要写八千字，著作不成熟。我虽从不以学者自居，但不能以此减轻责任，我的著作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解放后虽然踌躇了一下，还是出了。从中可以看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的著作。在我的著作中充满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治学方法。其中一些随感式的诗话、词话式的东西是封建文人的观点、方法；还有一些和封建士大夫不同的东西，这是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这些东西有五个特点：

（一）有不少封建文人的文学批评观点。有时赞扬一些落后的东西；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好的东西。例如，对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比较，扬陶抑谢，这是比较好的。但对“僮约”的肯定，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看法，是不好的。

（二）我那时所介绍的“新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那就是泰纳的英国文学史的观点，强调时代影响。此外还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受英国人莫尔干（Morgan）^①的“文学进化论”的影响。还受安德路·莱恩（An-drew Lang）的民俗学的影响，认为许多故事是在各国共同的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俗学者分为两派，一派是德国人麦克斯·皮尔〈Max Beer〉，主张各种民间故事都是一个发

^① 应为莫尔顿（Moulto，一八四九——一九二四），美国作家。

源地传出来的。一派是英国人安德路·莱恩，主张人类都有共同的环境，因此会产生同类型的故事)。还有弗来塞(Frozer)“金枝”(The Golden Boagh)也影响我。日本的厨川白村也曾经对我有影响。在写诗方面，我也受日本小诗的影响，我还接受了印度泰戈尔的形式。我受过各种派别的影响。

(三) 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把很多东西都看作外国来的。例如：我认为送子观音是受圣母像的影响；说释迦牟尼的脸是希腊人的脸，还认为唱戏的人在舞台上穿的厚底靴和戴的面具也是希腊悲剧的影响。我特别强调印度的影响，说变文是一切近代文学的祖先。把有唱有说的认为都是变文的影响。例如：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孙悟空也会作诗，我说这也是变文的影响。当然，各国文学都受国外文学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例如六朝有些诗，连话都是外国来的(梁武帝、沈约就受佛教的影响)，而像我那样强调是不对的。说近代民间文学都是印度影响是不正确的。我在布拉格讲学时，还未改变，到苏联讲学时就不那么讲了。我找到了一些材料，证明在变文同时，也已有说故事的人了，最有名的是李义山的诗讲到张飞、邓艾的三国故事。我还找到一些材料，说明唐朝已有人讲韩信的故事；可见唐代已有人说书。变文可能倒是受寺院以外的影响。在印度，对印度戏剧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印度戏剧是本土产生的；一派认为是希腊来的。我当时认为印度受希腊影响，中国受印度影响，结果还是中国受希腊影响。这是不对的。我过分强调了印度影响，甚至把说书的信木也说成是印度的东西。

(四) 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这是受安德路·莱恩的影响，

说这一故事是辛特利亚型（Cinderlla），那一故事是鹅女郎型。自以为是一种新方法。这里要说明一点：这方法是不好，但归纳为类型，倒不是说是外国来的。

（五）还有一点是立场没站稳，不是用马列主义去看人民的过去，把劳动人民的作品和皇帝的作品混在一起谈，没有分清。这主要表现在对待六朝的诗歌论述中。在《中国俗文学史》里也有这错误。对杜善夫的“庄稼人不识勾栏”这一侮辱劳动人民的作品，也加以赞扬。有为材料而材料的研究方法。

我本来觉得这些著作是二三十年以前写的东西，现在会有进步。我查了一下解放后我写的东西，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的重印，却没有加上新的序言，在少数地方改了一下。如去掉了一些引用胡适的话（当时编辑部也提出了意见）。我不能对以前写的东西不负责任。没有充分用马列主义方法。我在说明元代戏曲发展的原因时，原来臧晋叔有一个看法是元代以曲取士，我反对这论点。我从元代经济发达，农民生活改善来解释，说农民可以出钱看戏。我认为蒙古人进中国后，保留了能书会画有劳动技术的人，原来的统治者被打倒了，交通发达，商业繁荣。但我忽视了元代统治者不久就和原来的统治者地主是勾结的，例如赵子昂等人，都是地主。我没有看到地主统治仍然存在，把政治和经济分开了。在关汉卿研究的文章中就是如此。

解放后我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是《清明上河图》研究，有新观点，谈到了《清明上河图》反映的阶级矛盾。现在看来，其中也有教条主义的毛病。解放后我的文章大多是考古和艺术方面的。